

日治臺灣中等教育變革及影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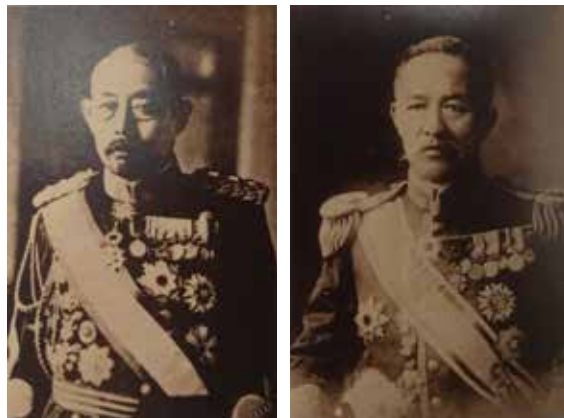
文／何義麟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） 圖片提供／國立臺灣圖書館

日治時期，臺灣的教育是由國家權力推動，政府透過學校教育，培養國家需要的「忠良之國民」。在此教育目標下，隨著統治方針從武力鎮壓、內地延長主義到皇民化運動，各級學校數量日漸增加，學校教育制度也不斷調整。1919年，臺灣總督府為因應臺灣人對教育的要求，以及在臺日本人子弟的增加，頒布〈臺灣教育令〉，建立較完整的學校教育體系。接著，1922年再度頒布新的教育令，中等以上學校實施所謂「日臺共學」，同年設立臺北高等學校，再加上1928年設立的臺北帝國大學，殖民地學校教育體系已臻至完備。然而，這樣的變革並未符合臺灣人的教育需求，差別待遇問題反而更為嚴重。

三年間兩度頒布教育令

1895年日本治臺，直到1919年明石元二郎總督任內，才首度發布〈臺灣教育令〉，整合殖民地公立學校的層級關係。為何相隔三年，又在1922年重新頒布教育令？簡言之，這是新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，為落實「內地延長主義」而採行的改革措施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後，各地民族運動風潮興起，1921年初臺灣出現議會設置請願運動，同年10月臺灣文化協會創立。為因應新的情勢，日本採行一連串



▲ 1919年頒行〈第一次教育令〉的明石元二郎總督（左）；1922年頒布第二次〈臺灣教育令〉的田健治郎總督（右）。

內地延長主義的政策，包括1921年頒布〈法三號〉以取代〈六三法〉，公布〈總督府評議會官制〉，遴選臺籍人士加入評議會，還有1923年將日本民法商法施行於臺灣（民法親屬繼承篇除外），1922年的新〈臺灣教育令〉也是其中的一環。田總督藉此發表聲明表示，新的教育令撤除內地人與臺灣人之間的差別教育，達到完全平等的地步，未來教化普及之後，必能達成與母國文明融合之目標。

1919年的教育令，共六章三十二條，第一條明定：「在臺灣對臺灣人的教育依據本令」。第二章起規範各類學校，中等教育機構部分，包括有普通學校、實業學校、專門學校、師範學校等，都訂定專章的法條。依照規畫，主

要都市分別設有男生就讀的高等普通學校之外，針對女生的升學管道，也新設女子高等普通學校。另外，各地依照產業需求設立實業學校，包括臺中商業學校、臺北工業學校、嘉義農林學校等。以上中學校與實業學校畢業生，如果要在臺灣島內繼續往上層學校升學，可以進入專門學校就讀，當時有臺北醫學專門學校、農林專門學校，還有新設的臺南商業專門學校，這些學校可以培養出更高階的技術人才。

總言之，兩次教育令的頒布，不只整備中等學校與高等教育體系，回應社會現實需求，同時將實業教育區分為實業學校與簡易實業學校，以滿足當時臺灣產業的發展。師範學校也是中等學校層級，為強化初等教育師資的培育，擴增為臺北、臺南、臺中師範學校等三校；1927年臺北師範再分割為第一與第二師範學校。

兩次教育令有何差別呢？1919年教育令，將學校教育體系化，並明顯的充實中等教育機構，但雙軌的教育系統依然存在。即使頒布教育令，本島人所受



▲ 1939年臺中商業學校舉行全臺珠算競技大賽。

的教育內容程度依然較低，制度上處於附庸的地位，赴日升學還是存有一些障礙。相對的，1922年頒布新教育令，整合學校教育為單軌系統，同時化解殖民地學校與本國教育機關銜接的問題。但這些制度面變革，並未解決臺灣人教育需求快速增加的問題。

「日臺共學」的虛像與實相

根據1922年的新教育令，第一條規定：「在臺灣之教育依據本令」，其中刪去原本「對臺灣人的」這幾個字，這表示教育措施不針對種族別來設計，同年〈蕃人公學校規則〉也被廢止。田總督公開表明決心，要以教育令打破種族區隔，並全面推動同化教育。

新教育令為解決初等教育現場學童日語程度差異之問題，第二條與第三條規定：「國語常用者」就讀小學校，「國語不常用者」就讀公學校，藉此避免初等教育有種族區隔的批評。而中等教育與大學教育不再有區別，標榜採取「日臺共學」，亦即日本人與本島人可一起入學。而且，包括中學校、高等學校、實業學校、專門學校、大學等，全部依照日本本國的學制與法規，都可與日本的學校銜接。官方藉此宣稱，臺灣人子弟升學管道暢通。

依照新教育令，初等教育與師範教育還有一些臺灣特殊性的考量。除此之外，其他中等以上教育都是援引本土法令辦理，不再有臺日人間的區別。配合地方制度的改正，中學校為州立，實業學校也由州政府管轄，不論男子學生或

女學生都逐年增加。中學生畢業後，可以進入臺灣或日本各地高等教育機構。但是，實際升學情況並非如此順暢。

新教育令實施之後，並未解決臺灣人缺乏升學機會的問題，亦即內地人依然壟斷中等與高等教育機會。原因在於，在共學的理念下，入學考試的標準並未改變，臺灣人在語言或經濟上往往處於劣勢，加上面試也有差別待遇問題存在，使得在臺日本人子弟獲得更有利的升學機會，臺灣人子弟則面臨更激烈的競爭。由於中等以上的教育機構增加有限，臺灣人子弟想要進入中等以上學校就讀的人數不斷增加，因此造成1920年代以後，不少殖民地青年必須支出更多的費用前往日本，才有進入中學以上學校就讀的機會。

共學制度下教育失衡問題

1922年新教育令的共學規定，入學總額是共用的，臺籍學生錄取率比日籍學生低很多，共學反而形成一道升學窄門。以臺北師範為例，原本公學師範部幾乎只錄取臺籍學生，小學師範幾乎只錄取日籍學生，所以共學對北師日臺學生入學機會沒有影響，但是1927年分為一師與二師之後，公學師範部也開始錄取日籍學生，以致最後北二師的日籍學生也變成多數。校友回顧時也表示，考上的臺籍學生是萬中取一，因此班上成績總是名列前茅，大部分日籍學生則成績平平。

對於共學問題，1929年林茂生在其提交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〈日本



▲ 1927年，臺北師範學校分割為第一與第二師範學校。(圖片出處／開放博物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)

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：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〉中，提出嚴厲的批判。他表示兩個民族之間中學教育的機會不平等，其原因不僅來自教育計畫不符合時代的需求，甚至遠遠落後社會的需求。另外，入學考試並非自由競爭也是原因之一。此外，中等學校招募學生時，還會從臺灣派遣教師到日本內地主要城市諸如東京、京都、大阪與福岡，給予入學考試，好讓日本學生到臺灣就讀中等以上學校。最後，他舉出1921年與1926年的統計數字顯示，日本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迅速增加，臺灣學生卻越來越少。

對於殖民地學校教育的發展，林茂生在論文中很不滿的表示：「臺灣學生希望得到與日本人同等水準的教育，從學校畢業以後擁有與日本人同等學力，如此他們才有能力與日本人一樣擔負有責任的職位；至今，這些職位幾乎完全由日本人占據。」回顧殖民地中等學校的擴增，最初是在臺灣士紳的奔走與集資之下，總督府才不得不在1915年設立

公立臺中中學校。而後，透過教育令建立較完備的中等學校教育體系，但臺灣人並未真正享受教育變革的果實。

中等教育普及與菁英人才養成

日治時期，學校教育是以同化臺灣住民為目標，中等以上學校的共學規定，只是升學制度的調整，其目的並非為促進教育機會的平等。根據統計，新教育令頒布後，公學校與學童數快速增加。在共學制度下，中學校就學人數持續增加，1922-1940年度累計，臺灣人就讀中學校共9,413名，日本人14,430名。此外，女學生升學就讀高等女學校的人數，也快數增加。

1925年臺北高校高等科開始招收高等科，來自臺中一中等全臺共十七所中學生，角逐有限的人學名額。根據蔡錦堂的統計，臺北高校每年尋常科直升約四十名之外，考試入學約一百六十名。到1945年9月共十九屆高校畢業生，總數2,479名，其中臺灣人有559名，約占22.5%，平均每年不到三十名入學，該校是全臺中學生升學的最大「難關」。

儘管在差別待遇的政策下，臺灣人教育機會受到打壓，但還是有大批的臺灣青年接受中等學校以上教育，成為社會中堅分子。除了島內升學外，部分臺灣人選擇赴日就讀中學或大學。他們畢業之後，有些人通過高等文官考試，有人取得律師資格，成為臺灣社會的菁英分子。

共學制度下，雖然教育機會並未全面開放，但許多臺灣人把握這個時機努

力向上，進而成為各領域的專業人才。戰後，這批近代學校養成的知識分子，大多成為臺灣政治經濟發展的重要領導人，這一點可能是我們在探討殖民地教育時要同時注意到的問題。

臺灣人對教育的努力與願景

林茂生不僅批判共學制度，同時也以近代民主主義教育理念，批判同化教育。他主張初等教育應以母語進行，認為：「近代教育的目的在於從學生的內在啟發其創造力，而不是由從外在給予強制性的灌輸，這樣只會破壞學生的創造力。」同樣的，蔡培火也曾倡議以臺語白話字來普及知識，林獻堂則努力提倡漢文教育，但這些訴求都遭到總督府的打壓。

正如駒込武在《「臺灣人的學校」之夢：從世界史的視角看日本的臺灣殖民統治》書中的分析，林茂生等人為抵抗同化教育，積極奔走企圖確保「臺灣人的學校」，但這個理想並未實現。戰後學校教育發展進入另一個階段，前人的教育願景還有待各界人士持續努力。✎



▲ 1928年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。(圖片出處／開放博物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)